

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及其宗教批判

王 兆 星

深入研究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它和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对全面地理解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演进和确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派别,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部活动内容就是批判,而其全部批判活动又贯穿于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始终。因此,它包含着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的发展过程。即:一方面,就其历史而言,它经历了形成、发展和分裂终结的进程;另一方面,就其批判活动内容来说,它经历了宗教(包括哲学)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等不同阶段。而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又以德国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转移。所以,为求窥其全豹,应从德国当时历史环境出发,把青年黑格尔派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

青年黑格尔派自出现到形成,是与宗教批判紧密相联的。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时期,也就是它的宗教批判的时期。二者是同步的。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形成于1839年,而它的宗教批判则一直延续到1842年。二者又是不同步的。

一、青年黑格尔派的出现和形成

十九世纪30年代,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深化,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导致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出现。

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黑格尔学派内部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初是围绕着宗教问题展开的,具有哲学——宗教斗争的色彩。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的本质。

早在1830年,费尔巴哈匿名发表了《论死与不死》的著作,肯定人类灵魂不死,否定个人灵魂不死。从此,黑格尔学派内部在灵魂不朽问题上陷入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虽愈益表明黑格尔学派内部分歧,但由于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不甚发展,社会矛盾不甚尖锐,所以上述争论在黑格尔学派内外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

随着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1836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问世,点燃了宗教批判的火炬,并大大激化了黑格尔学派内部分裂倾向,使之明朗化,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呱呱坠地的信号。

在《耶稣传》一书中,施特劳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开批判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正统基督教,开始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阶段。黑格尔认为,研究基督教,不必注意圣经和福音书的历史现实性,而只须着重考虑它们的哲学象征意义。在黑格尔看来,圣经和福音书是哲学的象征。他还认为,上帝作为绝对的东西由耶稣个人“完美”地表现出来,因而确定耶稣是上帝的化身,是信仰的对象。基于上述认识,黑格尔认为,宗教和哲学在本质上是—致的。它们只有形式的差别,而无内容的不同。宗教是通过表象、象征揭示哲学的理性内容,哲学是通过思维来认识绝对精神。它们的对象是具有客观性的永恒真理,哲学只不过是—在阐述宗教自身,而在阐述自身时,它也就阐述了宗教。

• 本文系作者文稿《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第一部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个问题。鉴于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本文力图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青年黑格尔派自出现到形成的历史发展和宗教批判活动,以及其在宗教批判活动中无神论的确立。

施特劳斯从理性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他从历史批判的角度，考察福音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对基督教这个精神堡垒发起了第一次冲击，驳斥了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观点。施特劳斯通过大量的考证，证明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故事绝大部分是由神话传说构成的。他认为，《新约》中的圣灵怀胎、耶稣的家世、治疗病者、耶稣复活等故事，都是基督教派无约束想象的意识产物。因此，他认为，圣经和福音书不是哲学的象征，不是历史，而是披着历史外衣的由早期基督教团体无意识创造的神话传说。其次，施特劳斯还驳斥了耶稣是上帝的化身的宗教教条。他并不否认耶稣这个人的存在，但认为把耶稣看作是上帝之子或“神一人”的宗教教条是纯粹的神话。他指出，说什么神灵的东西历史地体现于一个人即“神一人”的身上，这是不可能的。要使无限在某种有限事物中得到完全的体现，逻辑上是矛盾的。他认为，上帝这个绝对是不断体现于人类之中，从而实现自己无限的本质。基督即“救世主”是人类历史上作为一个类的整个人类，所以上帝的化身是整个人类，而不是个人。基于上述认识，施特劳斯认为，宗教的本质与哲学的本质是不相同的。宗教观念不是客观性的永恒真理，不是绝对精神，只是绝对现象的一个发展阶段，基督教不是绝对宗教，只是绝对现象一个不甚高的发展阶段，有力地批判了黑格尔调和哲学和宗教的观点。同时，还应看到，施特劳斯是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扬弃了黑格尔关于神的概念的形而上学超验的性质，否定了基督教的绝对性，这表明在宗教哲学的范围内他已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并对它作了初次突破。然而，由于他承认耶稣这个人的历史存在，承认福音故事包含了历史的真谛，这就为神学家留下了通路，并使自己同时承受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判。

施特劳斯《耶稣传》一书，有着很大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公开批判了基督教，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把基督教从绝对宗教的金字塔的顶端上推了下来，因而成为宗教批判的“头一个推动力”^①。其次，它公开批判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作了初次突破。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它是“第一部超出了正统的黑格尔学说的著作”^②。最后，它直接影响了当时一些有志青年的思想。不少青年通过它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

但是，青年黑格尔派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派别，这时并未正式形成。

围绕《耶稣传》的争论和因“教会纠纷”引起的青年黑格尔派与莱奥的论战，推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宗教批判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

1836年，为了驳斥正统基督教徒和保守的黑格尔门徒的攻击和指责，施特劳斯发表了《论争文集》。在施特劳斯的的思想影响下，随着《耶稣传》论争的发展，黑格尔学派内部思想上不断发生分化和再分化。1837年，卢格开始转向黑格尔派左翼。他在《玄奥的批判的新闻学》一文中，批判了老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柏林年鉴》，并为了对抗《柏林年鉴》，在泰奥多尔·艾希特迈耶的倡议下，他们合作开始筹办《哈雷年鉴》。1838年，《哈雷年鉴》创刊，它始初并无明显的政治性质，但由于其宗旨是“从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独立的、真正的批判，同时准确地说明引起当代人们注意的问题”^③，并且站在施特劳斯一边，因而实际上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杂志—共同活动的中心，对促使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838年，切什考夫斯基发表了《历史哲学引论》，提出了行动哲学。这是继施特劳斯之后，目的在于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的首次深入批判。

1837年的“教会纠纷”，直接导致了青年黑格尔派与莱奥的公开论战，从而加速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形成和哲学—宗教批判深化的进程。

1837年11月，普鲁士政府因同天主教教会关于不同宗教间通婚所生子女信教问题的纠纷，逮捕了科伦地区的大主教。这一政治事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即以慕尼黑大学教授哥列斯为代表的天主教和以哈雷大学教授莱奥为代表的新教正统派之间的激烈辩论。1838年6月，卢格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亨利希·莱奥给哥列斯的信》一文，既谴责了教皇至上论者哥列斯，又谴责了新教正统派莱奥，指责他们都是理性主义的敌人。于是，《哈雷年鉴》遭到了新教正统派的猛烈攻击。莱奥发表了《黑格尔党徒》的小册子，攻击青年黑格尔派是无神论的党。卢格对莱奥进行了反击。从此开始了青年黑格尔派同莱奥和新教正统派的公开论战并日益具有政治性质。

这次论战，进一步推动了青年黑格尔派各方面力量转向激进主义批判，并把他们联合在《哈雷年鉴》的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为一定的共同目标而斗争的思想政治派别。

1837年出现的柏林“博士俱乐部”，在论战开始后，愈益转向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1838年7月，“博士俱乐部”的思想领袖、柏林大学刑法教授爱德华·甘斯写信给卢格，对他的英勇论战表示赞赏和支持。1839年，“俱乐部”领导成员之一梅因发表了《亨利希·莱奥一隐蔽的虔诚主义者》的小册子，指责莱奥是一个隐蔽的虔诚主义者。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布·鲍威尔在《耶稣传》的争论和与莱奥的论战中，随着自己自我意识哲学思想的发展，逐渐地由原来的保守的立场转向激进主义批判。1838年，他在《启示史批判》一书中批判了正统派的观点。1839年4月，他发表了《致亨格施坦堡博士阁下。关于律法和福音书之间的矛盾的书信》小册子，首次集中地批判了正统的护教派神学观点。在论战中，他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和宗教观点，提出了批判哲学。布·鲍威尔的重新转向，对发挥“博士俱乐部”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哲学—宗教批判引向深入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费尔巴哈、莫泽斯·赫斯也都参加了论战。1838年底至1839年8月，费尔巴哈连续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论证了宗教与哲学的根本区别，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1839年，赫斯在他的《从斯宾诺莎信徒的哲学观点论国家与教会》的小册子中，捍卫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国家观点。

由此可见，自1836年至1839年，围绕着《耶稣传》的争论和莱奥的论战，以卢格、布·鲍威尔、费尔巴哈和赫斯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各方面的力量，以《哈雷年鉴》为共同战斗阵地，已逐渐地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为一定的共同目标而斗争的思想政治派别。所以，1839年标志着青年黑格尔派的正式形成。如恩格斯所说：“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④

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形成于1838年。其论据有二：第一，1838年莱奥发表了《黑格尔党徒》的小册子，把青年黑格尔派作为一个党派进行攻击；第二，1838年《哈雷年鉴》创刊，青年黑格尔派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⑤。这种观点提出的论据，无疑是青年黑格尔派形成的条件之一。但是，仅凭这两点论据是不足以说明青年黑格尔派形成的。诚然，青年黑格尔派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从来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可是，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派别，形成一个聚集青年黑格尔派各方面的力量为一定的共同目标而斗争的集团，应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这一条件在1838年尚未出现。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支重要力量柏林“博士俱乐部”，迄至1838年，还不允许其成员发表政治言论。其领导成员鲍威尔、梅因只是到了1839年才参与同新教正统派的公开论战。费尔巴哈、赫斯等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士也都是于1838年底到1839年才加入《哈雷年鉴》的斗争行列。可见，只是到了1839年，青年黑格尔派才以《哈雷年鉴》为中心，逐渐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思想政治派别。因此，上述观点，严格说来，不是很恰当的。

二、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深入发展

青年黑格尔派在形成过程中，继续把哲学—宗教批判引向深入发展。冯·切什考夫斯基开创了对黑格尔哲学革命改造的道路；布·鲍威尔在深入哲学—宗教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哲学；费尔巴哈结束和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批判。

冯·切什考夫斯基于1838年发表了《历史哲学引论》的小册子，首次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和革命改造，提出了行动哲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世界历史表现着观念、精神的辩证发展进程；精神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据此，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的、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基督教的三个时期，并且认为威廉三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等级君主制度就是历史实践的终结。

切什考夫斯基批判指出，黑格尔的功绩在于，他从过去推演出世界发展的规律。而他的错误则在于，他只是把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应用于解释过去，而不把它应用于解释现在和未来；他只强调绝对精神、观念，而不注重人的意志，因而使人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成为绝对精神的不自觉的工具。为了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革命改造，他提出了行动哲学。所谓行动哲学，就是关于未来和人的意志决定历史发展的哲学。切什考夫斯基认为，哲学的任务是确定未来，必须把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推广应用于解释现在和未来。他从费希特关于应有和现有相对立的原则出发，认为未来就是社会主义，并且把傅利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当作未来的原型。其次，他强调指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的意志，即人的思想和行动的结合，并且第一次提出了

“实践”这个词。当然，他的所谓“实践”，实际上只是一种精神批判。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但由于它突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保守结论，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布·鲍威尔原系黑格尔保守派，1838年开始由保守立场转向激进批判。随着斗争的发展，他不断深化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宗教批判，提出了批判哲学，最终走向无神论和哲学上的激进主义。

1838年，他在《启示史批判》一书中，对新教正统派的神学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从主观精神出发，把宗教主观化，认为宗教是与上帝有关的主观精神的一种作用。在他看来，人对上帝的态度是一种精神活动，上帝是心象作用的产物，人的精神活动是宗教的来源。因此，所谓宗教启示其实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在运动。而“旧约”和“新约”只不过是自我意识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新约”比“旧约”进步，是更高的表现形式。这就批判和否定了新教正统派把“旧约”和“新约”看作是宗教启示的表现形式并具有同等价值的神学观点。

1839年4月，布·鲍威尔发表了《致亨格施坦堡博士阁下。关于律法和福音书之间的矛盾的信》，批判了亨格施坦堡关于律法与福音书之间没有矛盾的观点。亨格施坦堡认为，律法（犹太教用语，指《圣经·旧约》）和基督教的启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基督教启示的出现丝毫不否定律法。因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继续，基督教启示是犹太教启示的继续。鲍威尔批判指出，律法和福音书是有差别的，基督教和福音书同主观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识是一致的。而犹太教及其律法是强制的、外在的。因为它尚未达到认识自我意识的地步，它只是一个本质上不同于它自己的意志的上帝的意志。所以，它与主观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识是对立的。它束缚自由的主观性，并妨碍主观性认识自身及其使命。由此，他认为基督教不是犹太教的直接继续，基督教启示也不是犹太教启示的继续。

1840年至1842年为鲍威尔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连续发表了《约翰福音史批判》、《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等著作。他在深入批判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确立了无神论的观点，提出了批判哲学。

在福音书批判中，鲍威尔从“自我意识”范畴出发，认为福音书以及书中所叙述的福音故事是由富有想象力的信仰基督教的作者根据一定的批判倾向有意虚构的自由创作。福音书是异化的自我意识。如他所说：“自我意识在福音书中同自己发生关系，尽管是同异化的自己，也就是同自己的极其滑稽的模拟品发生关系，但毕竟是在同它自己发生关系。”^⑥由此，在他看来，宗教只是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一种虚妄的、歪曲的、颠倒的意识。这就批判了施特劳斯关于福音书是原始基督教团体无意识的神话传说的泛神论的观点，并从根本上抹去了宗教的神性灵光，埋葬了人们对它的虔诚和敬意。与施特劳斯相反，鲍威尔还根本否认耶稣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此打消这一念头。可见，对福音书的批判，使鲍威尔得出了类似费尔巴哈的结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走向了无神论。

鲍威尔还以普遍的人类自我意识与黑格尔的宇宙精神的绝对观念相对立。鲍威尔认为，普遍的人类自我意识最本质的是发展，当它在一种形式中得到实现之后，这种形式便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更高级的形式。同时，它又是无限的，这就是说，它是没有边界的。黑格尔并不完全否认自我意识，但只把它看作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一个阶段。这就是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出的产自人的不幸意识的亚里斯多德以后希腊哲学阶段，即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论等哲学流派。他摒弃这些学说，而以基督教与之相对抗，把基督教看成是宇宙精神的最高表现。与之相反，鲍威尔认为，晚期希腊哲学流派是普遍自我意识的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表现形式。至于因罗马世界统治和希腊哲学影响而出现的基督教，同样也只是普遍自我意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种受时间制约的、暂时的形式。尽管在当时基督教代表着进步，但现在它已成了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为了实现自我意识，他认为，其手段就是批判。批判就是把对象改造为自我意识的活动。它的任务就是扫除阻挠历史前进的一切障碍。由此，鲍威尔指出，现在，人类最伟大的任务就是：对基督教以及浸透基督教精神的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

鲍威尔的这种以普遍自我意识为核心，以批判为手段的批判哲学，由于它把启示归结为普遍自我意识，最终导向无神论，因而超出了施特劳斯的“实体”范畴的泛神论哲学；由于它不仅提出了决定未来的任务，而且提出了批判作为解决这一任务的手段、途径，因而超出了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由于它认定普遍自我意识是发展的和无限的，并否认任何实体和历史形式是自我意识的最终体现，因而清除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超验的和反动的因素，是继施特劳斯和切什考夫斯基之后更加深入地改造并超出了黑格尔哲学。

鲍威尔的批判哲学，要求用批判改造现存事物，要求赋予批判以根除一切不合理事物的权利，这就为解放思想、发展革命理论开辟了道路，并从理论上为革命运动进行了辩护，因而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但是，它主张把精神发展同具体现实分开，把应有和现有对立起来，从黑格尔退回到费希特，因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这正是鲍威尔不能彻底完成宗教批判以及后来走上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根源。

费尔巴哈结束和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批判。1838年至1839年，他正式参加了《哈雷年鉴》同莱奥的公开论战，在《哈雷年鉴》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因而实际上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发生了密切联系。迄至1838年底止，费尔巴哈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1839年8至9月，他发表在《哈雷年鉴》上的第三篇论文《黑格尔哲学批判》，表明他已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

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费尔巴哈径直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唯心主义。他指出，黑格尔是通过把感性事物，具体现实灵化，获得了精神与存在统一的原则，即存在是精神的异化，精神是存在的本质。他认为，“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界，最普遍意义的自然界。”“只有回到自然界，才是幸福的源泉。”^⑦

《黑格尔哲学批判》标志着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彻底决裂和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不过这种唯物主义象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一样，自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1841年夏，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运用唯物主义原则分析批判了基督教。

在批判中，费尔巴哈提出了宗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他认为，人由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威力所造成的灾害和痛苦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因而便想象出一种具有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威力并能经常给人以保护和幸福的创造奇迹的存在物，于是就产生了宗教。如他说：“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本质，是净化了的、摆脱了个人局限性，即摆脱现实的、肉体的人的本质，是客观化了的，即被视为并被当作彼岸的独立本质而受到敬仰的、人的本质。因此，神的本质的一切规定也都属于人的本质。”^⑧神不能脱离人而存在。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由此，他得出结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而上述的人神关系，在宗教中是颠倒的。真正的主体，人，变成了它所创造的神的属性、宾词，而神反而变成了创造一切、全能的主体。费尔巴哈的功绩就在于，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与施特劳斯、切什考夫斯基、鲍威尔的批判相比，费尔巴哈的批判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极为重要的意义。前者的批判，就方法说，他们采取的都是唯心主义思辩的方法；就对象说，在哲学方面，他们都是着眼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在宗教方面，施特劳斯把教条神学（基督教教义和耶稣的一生）作为批判对象，鲍威尔把圣经神学（福音书）作为批判对象。因此，尽管他们在哲学—宗教批判上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佼佼者如鲍威尔，在宗教批判上得出类似费尔巴哈的结论，在哲学上提出了批判哲学。但是，他们都未能彻底完成对宗教的批判，未能瓦解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的批判则根本不同。他从唯物主义的方法出发，对黑格尔哲学的基础和基督教进行了批判，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得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结论，从而有力地摧毁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促进了黑格尔哲学的瓦解，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代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观，并彻底地批判和抛弃了基督教。可见，正是费尔巴哈结束和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⑨

40年代初，青年黑格尔派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活动及其代表人物的进步思想因素促进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发和确立，并进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2页。

② 同上，第1卷，第589页。

③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66页。转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13页。商务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2页。

⑤ [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第36页。三联版。

⑥ 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第130页。北京大学版。

⑦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84页。人民出版社。

⑧ 同上，下卷，第3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